

编者按 近年来,国际战略研究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位凸显,成为继“国际关系理论热”之后新的研究重点,战略研究作为本学科知识发展的又一个有力生长点,受到学界广泛重视。本质上,国际战略研究与国家对外关系实践关系密切,又有其特别的学理定位,不同于纯粹的政策研究。近年来,中国学界的国际战略研究取得哪些进展?当代国际战略研究的创新点是什么?当下国际战略研究存在哪些问题?如何看待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发展前景?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刘毅专访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唐永胜教授。唐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战略学、国家安全战略、中美战略互动研究等,发表《21世纪全球政治展望及中国前景》《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构想》《当代国际资本》,等等。

当代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进展与创新

——唐永胜教授专访

本刊特约记者

一、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概况

刘毅(以下简称“刘”):近年来,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取得哪些主要进展?

唐永胜(以下简称“唐”):近些年,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取得较大进步,无论是学科体系的建构与完善、研究内容的拓展与深化、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及其多样化,还是研究机构和人员的专业化、专业出版物水平提高和成果数量的增

长,都是过去任何时期不能比拟的。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认为“战略化”是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最重要的进展方向之一。为适应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化发展和国家决策的迫切要求,学者们尤其加强了对一系列重点、热点及难点问题研究。这些问题的提出,主要来自对世界体系变迁和中国对外战略实际需要的积极思索,如当下国际格局的战略变动,中国在世界及亚太地区的地位、作用与互动关系,国际体系变迁带来的战略条件变化及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中国对外战略选择等。

另外也有一些问题主要是根据国际战略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而提出来的,如建立世界新秩序问题,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关系及国际形势的影响,国家利益及安全观的变化,等等。这些研究对中国观察认识国际形势的深刻演变,应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是十分必要的,但显然还不够。如果国际战略研究没有一个体现国际政治基本规律并符合国际政治发展潮流的理论框架,现实问题研究难免会失去线索甚至方向。理论上的澄清和说明是现实问题研究的必要前提。因此,国际战略的“问题研究”范围不断拓宽和深入,使得建立国际战略研究的完整理论体系和加强学科建设问题成为必要,并且具备了基本的可能性。

近年来,有关国际战略学的理论著述日渐丰富和完善,学理探讨更加规范化和系统化,初步形成和建立了独立的国际战略学学科,专门的国际战略研究机构 and 学位教育也陆续建立并完善起来。在国际战略学基本理论研究上,围绕国家利益、新安全观、国际机制、国际政治基本规律、国际互动的特点更新,以及国际战略的文化基础等理论问题,国际战略学者发表了大量专题论文。

当然,研究水平的提高不仅体现在理论性专著和论文水平上,同样体现在专业学术刊物的发展上。由于国际战略研究的发展,一些原有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刊物,如《现代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问题研究》《当代亚太》《国际政治研究》《欧洲研究》《国际安全研究》等逐渐开辟国际战略专栏,强化对国际战略理论与现实问题的关注,学术作品的科学性和规范化逐步提高。

刘:您如何理解当代国际战略研究的创新点与创新过程?

唐:对于国际战略研究和筹划,寻找规律、适应规律、运用规律就是最大的创新。要深化战略研究,关键在于提升对重大战略问题进行规律性研究的能力,由此才能形成学术发展的坚实基础。否则,很有可能流于空泛,不能适应

大战略博弈的现实需要。

从根本上讲,战略领域的学术研究要求语言逻辑和形式逻辑为事实逻辑服务。能够揭示问题发展演变的逻辑线索,才能算作高水平的战略研究。只有发现规律才有战略创新,离开规律来谈创新只能是缘木求鱼。那么,理论和实践如何统一?我认为,理论和现实应统一在对事物规律性的认识。实践中得出规律性认识,就具有了理论价值和理论内核,而理论不能解释现实问题,不能揭示规律,就不具备理论形态。

国际战略研究的精髓在于努力找到事物的内在规定性,进而能够比较准确地推测其未来走向,而战略谋划也只有在遵循国际局势发展演变的历史逻辑条件下才能表现出应有的功效。因此,加强对国际局势演变规律的研究,是提高中国国际战略研究水平的最紧迫要求,许多学者正为此付出辛勤劳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取得明显效果。

当前,国际体系的运动变化正逐渐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整体特征,把握这种整体特征,研究分析国际体系的基本作用规律,并在这种整体特征和作用规律下探索中国的国际战略,是中国未来国际战略研究的基本取向之一。中国未来的发展、安全乃至生存与国际环境联系更为深刻,国际战略更具系统性、整体性、主动性和长远性,这说明中国的国际战略只有适应国际政治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基本规律,在这种适应之下强调中国的目标和利益,这样的国际战略定位才是切实可行的。因此,中国未来的国际战略研究必须适应世界局势的演进和重大变化,在国际整体环境运动变化之下探索国际政治发展变化的基本线索。

综观当今世界,各种多元化要素与复杂动能共同发挥作用,微观意义上的不确定性空前突出,运用过于简约的理论分析方法恐怕不能很好地反映国际局势的发展。尤其是国家间相互联系的增强及其对整个国际体系产生的作用,一系列过程积累起来可能造成的巨大事变,其影响具有基础性和渗透性,认识其内在逻辑需要洞察力和前瞻性,观察其发展演变的整个过程,避免受固定思维的束缚。

对于国际战略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我们越来越需要多角度和综合性分析,需要广阔视野和创新思维。局限于某种偏好、某一理论或视角,在寻求日益复杂的问题背后所隐藏的规定性时,显得越来越无能为力,有时甚至无异于缘木求鱼。新的历史条件为思想家和战略家开启了认识世界的新空间,关

键看如何在思想和学术上积极准备、积累和创造。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指出,国家大战略是指“一国基于全局观念,为实现国家根本目标而开发、动员、协调、使用和指导国家所有政治、军事、经济、技术、外交、思想文化和精神等类资源的根本操作方式”,“是基于经过深思熟虑的、手段与大目标之间关系的全面行动规划”。^① 基于该项定义,时殷弘认为,大战略研究的创新应该集中于战略目标、战略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战略手段与资源基础、战略决策体制机制、战略思维方式、战略艺术才能与领导素质、大战略的国内国际合法性等诸方面。他进而指出,战略研究创新的关键是如何恰到好处地认识“战略的目的、手段、效益、代价”之间的全局辩证关系,在多项利益目标之间确定合适的次序,将关注点和努力点始终放在那些最重要的事项上。^② 在理解当代国际战略研究创新的可能方向及其量度方面,时殷弘教授的理解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刘:您如何理解当代国际战略研究的综合性与变动性?

唐:我想以地缘战略与周边战略的结合为例来说明所谓综合性。经略周边构成中国对外战略的地缘基础,周边战略问题研究也要与周边国家地缘特征紧密结合。地缘战略学者尤其强调这一点。周边地区战略格局及其安全形势演变对中国的安全和发展构成最直接的影响。保持一个相对稳定可预期的周边安全环境,不仅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可靠保障,还是实现持续发展、和平崛起的必要条件。

随着周边力量结构的迅速变化,尤其是中国实力的迅速上升和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正在发生重要调整。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表明,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几乎都将经历这样一个相似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将持续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在此期间,崛起困境会较为充分地表现出来。许多研究都认识到,周边是中国发展对外关系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地区。中国的命运与周边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切。

但是,学界研究普遍关注到,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周边地区出现一系列紧张局面,与美国的战略运作行为存在或明或暗的关联性。美国的战略调整尤其是“亚太再平衡战略”,将进一步强化对中国的战略防范和挤压态势,对中国

① 时殷弘:《国家大战略理论论纲》,《国际观察》2007年第5期,第15页。

② 时殷弘:《战略观念与大战略基本问题》,《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第20页。

的和平发展形成严重阻碍。美国将继续利用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负面研判及中国周边战略布局不尽完善的情况,强化其战略影响,力图增加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隔阂,挤压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作为空间,以维护和巩固其在东亚安全格局中的主导地位。

但从总体上看,有效维护周边安全面临的诸多挑战基本属于发展中的问题,许多安全难题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在新条件下的凸显,如钓鱼岛问题。今天遇到的一些难题是中国在上升时期出现的新问题,应该有信心解决好。实际上,虽然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之间存在着许多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但相互间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周边没有强大的对手,对中国构成现实重大军事威胁,这一局面仍将保持。与中国存在领土争议的国家基于利弊权衡或自身实力考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难以挑起大规模军事冲突。只要中国政策得当,坚持和平发展基本方向,周边国家对中国迅速发展的不适应将被积极因素抵消和取代,中国有条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相对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为进一步发展赢得时间。这一点或许可以视为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某种共识性前提。

经略周边必须与中国的地缘条件结合起来。对此,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周方银教授强调,要坚持互利共赢、保持威慑、进行适度战略安抚三方面的有效结合,实现政策手段的相互配合。在总体上就是要不断积累和充分发挥亚洲中心国家优势,适应和利用地区局势的复杂性特点,综合运用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手段,加大经营周边的力度,维护亚洲安全和繁荣,为和平发展提供重要的保障和支撑。中国实力上升对周边的地缘影响必将不断得以强化,周边国家加强与中国的密切联系将会得到成倍收益,反之,也将遭受成倍损失。只要注重战略筹划,政策得当并坚持不懈,中国经营亚太将取得丰硕成果,与亚太国家的关系将成为安全与发展的有利而持久的地缘依托,“睦邻、安邻、富邻”政策也将产生巨大效应和吸引力。在近年来全球经济最低态势下,亚太地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风险依然严重,中国的抵消作用仍有其战略作为的空间。

关于战略研究的变动性,我想以中美日三边战略互动研究为例来说明。中国、美国和日本是影响当前及未来较长时期亚太地区安全局势发展变化的三个重要国家,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中美日三边关系在亚太安全中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已成为决定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因素。未来亚太安全局势

的发展与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日三边的战略互动。如果没有中美日三国的协调合作,就很难维护亚太地区的总体和平、安全与稳定。中美日三边关系如何演变,不仅对中美日三国自身具有关键意义,而且在影响和构建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方面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中美日三边关系的研究已取得相当成果,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陆续发表了大量专著和论文,重点是从格局变迁、利益联系、历史演变等角度研究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发展变化及运行模式,研究日渐系统深入。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仍有一些三边问题研究过于着重分析三组双边关系,而较少进行总体把握和系统分析。不可否认,中美、中日和美日关系是构成中美日三角关系的重要基础,但双边关系的简单相加并不是全部,研究中美日三角关系更要注重其本身的特质和内在规定性,也就是说要用系统关联的战略方法,更多地关注三边关系整体的变化发展问题。

美日同盟对三边关系的影响也是研究的重点。美日加强安全同盟,说明配合协调仍然是今后一段时期两国关系的主要方面,由此中国将面临更多的战略压力。从长远看,美日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难以取得成效。一些研究已经揭示,美日两国在国家战略层面存在着内在矛盾。日本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安排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同美国的霸权地位存在冲突。日本并不情愿长期处在美国阴影之下,一旦日本企图摆脱美国的束缚,美日矛盾必然上升,从而将影响到日美同盟的前景。

实际上,日本东西方难分的模糊地位使其对外关系不能单向取舍。从长远来看,日本在与中国、美国的利益关系中,矛盾与协调的两重性仍将显现出来,这也表明其对外战略仍将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中美日处于相互依存与制约、协调与斗争、合作与竞争的体系之中;彼此存在防范和猜忌的美日双方为防范和限制中国的快速崛起而进行较多的战略配合,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将有所增加,但中国和平崛起的势头依然强劲,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出现日益成为现实,美日对中国的防范和遏制将越来越力不从心。更何况中美日三边关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三边关系处在快速变动的亚太整体战略格局之中。第一岛链不应简单视为中国和美日之间的对抗线,而是属于一种战略磨合线。

许多战略研究者提出,立足长远,中国须不断提高战略管理能力、危机控制能力和威慑塑造能力。只要中国立于不败,日本将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寻求必要的平衡。运筹三边关系,还需全面准确把握大国关系的时代特征,积极拓

展战略合作空间,有效制衡和努力消解美日对中国的防范和挤压,努力引导中美、中日关系发展的方向,塑造三边关系积极的可预期发展的总体框架。虽然这项战略研究面临的实际情况经常发生变动,但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类似的重大战略问题还是具有其稳固的机理,很难发生根本性的变动。这也是我提到的战略研究恒常化特征。

当然,关于国际战略的变动与沿革问题,还存在多元化理解思路。相对于战略研究的变革而言,国际战略的演进可能是一个更为主动的变量。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给出一种更加哲学化的理解。他指出,国际战略是在变化中延续的。他以中国国际战略的外部观感、所谓“中国傲慢论”“韬光养晦”“奋发有为”的矛盾理解为例,论证关于中国国际战略的变革式研究。在这些看似矛盾的战略构述背后,是一种和顺的、以“中庸”为基础的背景知识。战略的转变并非一蹴而成,延续与变革同时存在。就中国的国际战略而言,“延续”意味着坚持战略目标、设计和政策的整体性;“变革”体现在对事关国家利益要素的界定方面。中国的国际战略因此既非傲慢,也不是一味低调,而是一种“变化中的坚持”。^① 对国际战略研究者而言,这种观念或许能够提供较多的启示意义,就是说相应研究需要兼顾“处于延续和变革两种状态之下”的国际战略,对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国际战略研究而言尤其如此。

二、如何看待中国的国际战略

刘:您如何理解当代国际体系变迁与中国对外战略的互动关系研究?

唐:国际体系变迁及由此带来的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关系,既是近年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也是一个难点。对于国际体系的发展变化,许多研究者和战略家试图从不同视角进行分析,包括“一超多强”“又一个美国世纪”“全球化时代”“中美共治”“后美国世界”“无极时代”等,诸多不同视角和理论大多具有独到的解释能力,其中亦不乏非常深刻和精彩之处。然而,一旦尝试将不同的观点进行综合梳理,又很难取舍,感觉头绪繁多。也许这种杂乱无章体现的某种复杂逻辑本身就是对国际局势一种不可忽视的认识途径,多维世界需

^① Qin Yaqing, "Continuity through Change: Background Knowledge and China'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7, No. 3, 2014, pp. 285-314.

要从多维视角来认识和理解。

实际上,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世界开始进入一个崭新阶段,世界到处充满动荡、冲突和矛盾,但又保持着总体上的动态平衡,多年来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国际政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复杂,系统效应突出,因果关系繁多。上海社会科学院黄仁伟教授、刘鸣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林立民研究员等学者针对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的特点和趋势有系统的分析,特别涉及权力转移进程的战略影响深度问题。

这种转型带来国际局势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空前突出,用过去习惯的、过于简约的理论分析方法,恐怕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发展。世界在变化,中国也在经历变革,民族复兴需要在国际体系的变迁中得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不可能不遇到任何战略困难,不仅现代化进程必将遇到曲折或艰险,转型期的国家安全也面临诸多严峻挑战。变革的中国面对变化的世界,在新形势下谋求国家安全,需要更积极、更深入的战略思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袁鹏研究员曾经指出,“中国崛起既是体系变迁的重要推力,也是体系变迁的主要结果”。^① 国际体系的变迁可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新的条件,同时也提出巨大挑战。因为变化已经带来权力政治的进一步松动,减少体系的惯性制约,带来战略机遇和启动空间;但是,在国际体系变化过程中,中国实力迅速提升更容易引起反弹,若处理不当有可能成为体系变迁中诸多矛盾聚集的焦点。要成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要从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寻找基本逻辑和内在动力,而且也要将其放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深刻调整的大背景下来认识和筹划。

在变化的世界中,国家面临新任务并需要做出新选择。亨廷顿曾提出“我们是谁”的问题,他看到美国国家特性受到的挑战,认为美国已经到了何去何从的紧要关头,若大力捍卫和发扬盎格鲁新教文化这一根本特性,美国就有分化衰落的危险。实际上,变化在今天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常态:在全球范围内,单纯的权力政治逻辑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认识当前的世界政治必须要有不同以往的、更宽阔有效的视角,谋求国家生存和发展需要更具包容性和更有远见的战略思维,战略筹划既要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也必须具有必要的弹性,以适应新条件下国家间的战略博弈。

① 袁鹏:《国际体系变迁与中国的战略选择》,《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11期。

国际体系变迁不仅强化了国际机制的作用,呼唤更有效的全球治理,同时也要求强化大国之间的协调和合作,有效促进全球战略稳定。秦亚青教授认为,治理需求加大与国际制度供应不足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全球战略稳定面临的重大挑战,在比较混沌的国际体系中理出必要的秩序,建立和强化战略稳定,已经成为大国不可回避的责任。

在新的条件下,中国要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并为世界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在根本上就是要审时度势,充分认识和顺应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在历史发展大势之下谋求国家的生存和长远发展。换言之,大战略的使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为世界设计出某种“自以为是”的结局,谁也不可能“凭借国家的力量把自己的奇思妙想、周密蓝图强加于客观世界,而只能审时度势,做历史发展允许做的事”。^① 在过去的几百年中,英国、美国曾先后积聚了巨大的权力优势,成为世界霸主。然而,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历史条件下,一国要独领世界风骚已越来越不可能;缺乏有效的国际合作与协调,就不可能成功应对全球性挑战。如果一味认准霸权兴替的传统原则,无论是想继续维持霸权优势还是谋求新的霸主地位,试图凌驾于他国家之上,一定会被历史遗弃;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依据不仅依赖自身的努力,也在于国际关系的发展为之提供了新的条件和机遇。

刘:中国是否存在完整清晰的对外大战略?您如何看待学界关于中国“对外大战略”的研究及相关设想?

唐:关于中国是否存在完整清晰的对外战略,多年来一直都有争论。有种观点认为,中国并没有系统的对外战略,缺少对外工作的统筹。事实上,中国历来高度重视对外关系和国家安全,审时度势提出各个时期的对外战略思想,并积累了丰富的大外交和国家安全实践经验。即便当时没有出台正式的战略文本,但相关战略思想却为有效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基本保障,并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科学总结了对外关系和维护国家安全已取得的经验,鲜明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对外政策,通过了共和国历史上第一部国家安全战略纲要。中国对

① 高金钊主编:《国家安全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57页。

外战略“奋发有为”的特征更加明显。学界至少可以对“中国对外战略确实发生了变化”这一命题达成某种共识,至于具体变化方向及变化幅度等若干问题,则有不同的看法。当然,世界形势也正在深度演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不断调整,国家的对外战略不可能一成不变,相关战略思想需要与时俱进,对一些重大战略问题的认识需要不断深化,这也正说明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面临着空前的机遇。

此外,学界也有一些研究,例如,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宋德星教授提出“战略现实主义”。他认为,中国作为非西方新兴大国,应该确定一种体现本国战略心理特质、符合国情的现实主义基调。中国的国际战略应把握安全、发展、和平、正义等若干核心价值,规划其力量运用的方式与力度即所谓战略现实主义。这一提法虽然也在很大程度上遵循“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基本逻辑,但以安全和强盛为根本价值追求,以恰当维护本国利益并实现内外利益平衡为出发点,明智地使用权力,优化国际国内局面。^①当然,这类观点意在描述国际战略的基本取向,而未必是具体政策的精确预定或塑造。

三、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方法及应注意的问题

刘:您如何看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方法?

唐:在国际战略研究领域,学界针对科学研究方法有很多讨论和努力,推动了科学研究方法的普及和丰富。不同于一般国际关系问题研究,国际战略研究具有总体性、竞争性、前瞻性和变动性的基本特点,相关问题研究需要适应这样的要求,否则就会失去战略研究的特性。毫无疑问,国际战略研究属于科学研究范畴。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阎学通教授认为,科学研究方法与其他研究方法有所不同,科学的研究方法更强调客观实证,以程序性、实证性和共同规则为科学研究方法的标准,则可将科学方法与其他研究方法区别开来。科学研究方法的程序至少要包括发现问题、提出假设、概念操作化、实证检验、得出结论几个环节。

但是,战略实践不能在实验室中预制和勘误,因此,理论也不能在实验室中证实和证伪。绝对观念的真理性在鲜活的历史逻辑面前没有立足之地。北

^① 宋德星:《战略现实主义:中国大战略的一种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9期,第4—18页。

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张文木教授主张在国际问题研究中提出“历史逻辑”,就是一个将逻辑归还历史的过程。时殷弘教授也认为自己的研究受益于历史分析。例如,他曾经以历史上存在的“武装的中国”为例,讨论了当前中国国际战略的历史蕴含与基本线索问题,给出了不同于一般分析的战略研判。同时,时殷弘教授对大战略、国际战略学的研究也都体现出历史意识的深刻影响。

但国际战略研究毕竟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社会科学具有高度的人文成分,其复杂性难以化约为简单的科学公式。因此,引进科学方法要注重与传统方法的结合,但即使是在西方,科学方法仍然不是战略研究的主流方法。秦亚青教授曾指出,要解决研究方法论的分歧,“应该走一种科学与人文契合的第三种方法”。^①那么,是否存在国际战略研究的“第三种方法”?在具体国际战略问题的研究中,学者们的努力实际上更为丰富。在坚持传统研究方法优点的同时,引进系统分析、信息理论、博弈论等科学研究方法,借鉴许多西方国际战略理论,如均势、战略文化等,推动国际战略研究多样化发展。

关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方法问题,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门洪华教授做出专门归纳。他认为,国际战略研究具有全局性、复杂性、前瞻性特点,研究方法也是多样化的,主要包括历史分析、比较分析、个案分析、定量分析、实地调研等。他认为,战略研究应具备必要的历史感,基于前人经验进行跨时空对话,本着客观科学的态度揭示各要素间的实际联系;同时应展开必要的比较参考,找到本国的优势基点与弱势盲点;此外还有必要展开个案分析,具体看某一时期特定战略的成败优劣与经验教训,避免一味空泛论说,不接地气。为此还可以考虑适当引入定量或调研等社会科学通用方法。^②

关于研究模式问题,我有如下的体会。一般而言,学者对国际战略的本质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不同的研究模式和研究视角。借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李少军研究员关于国际战略模式分类的观点,描述国际战略学者在国际战略研究中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类型:如果某位学者继续按照现实主义的力量均势逻辑研究和看待在多极竞争的无序体系中国家角色和相互间作用,那么,他很可能倾向于用地缘、均势等理论和方法来指导国际战

① 秦亚青:《国际关系研究中科学与人文的契合》,《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② 门洪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议程与方法》,《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2期,第51—58页。

略研究;相反,如果他认为国家除了权力逻辑之外,还有一些新的尽管是次要但在当前越发重要的双赢选择,他很可能会强调制度合作、观念和文化建构来设计国际战略模式。

刘:国际战略研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唐:首先,要注意研究的综合性和系统性,不能简单地套用“两点论”。战略研究不能凭感觉,走到哪算哪,或者两头堵。总有一些研究习惯于沿着一条逻辑线索推到底,这是一种简单线性分析的方法。简单的线性分析只能得到越来越大的毛虫,而实际上毛虫不会无限长大,成长到一定程度将羽化成蝶。只用线性分析永远看不到漂亮的蝴蝶。对于许多战略问题,因与果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并非紧密相连。这需要观察一系列的变化过程,而不是某些具体片段。战略研究还应注重边界条件,不讲边界条件的分析最多只能做到片面深刻,而这对国际战略筹划和维护国家安全是十分危险的。对特定问题,需要放在特定背景和条件下进行分析。在当今国际关系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就更需要综合的系统性、结构性分析才能解决问题。比如,研究南海问题存在多种方法,然而不论运用什么方法,都必须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进行思考:今天的南海是中国与外部世界深度互动的一个重要的接触正面,是中美之间大战略博弈的一个重点和焦点区域;由于周边一些国家对我国迅速增长出现战略躁动而处于紧张时期,南海争端是中国经营周边必须破解的难题。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在安全与经济之间实现某种“战略脱钩”,虽然这种脱钩难度不小,但值得进一步细致论证和操作。

其次,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国外的理论。与西方相对比较成熟的理论相比,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的原创性很少,要想实现超越更有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引进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甚至问题研究是必然的和非常有益的。然而,借用国外的研究理论和问题,并不等于简单地照搬,而要注意其适用性和合理性;另外,借用也不等于不注意国外理论话语背后隐藏的他国立场和利益视角。实际上,社会科学诸学科理论很少有像国际战略理论那样直接而明确地服务于特定国家和国家集团的立场和利益。西方虽然也有些超越国家立场和利益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理论,但从整体上看还是为了服务于西方政治利益。比如,一些学者在批判“文明冲突论”的同时,却不自觉地对于西方文化传统在国际政治和国际战略研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观点给予承认。

再次,不能忽视甚至抛弃经济这个最核心因素。注重文化因素在国际关

系及各国对外政策中的作用固然很必要,但决不能舍本逐末。西方目前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及相应外交政策正是通过有意无意地对文化和价值观的强调,掩盖利益角逐的核心命题,意在以文明和价值观冲突消解国际关系中利益对抗的真实意义。所以,正确理解国际政治冲突和合作的本质,离不开对目前由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权力体系运动变化的正确把握。文化只是解释战略行为的因素之一,并不能决定战略行为。

最后,研究战略问题要夯实哲学基础。有些国际问题研究缺少深厚的哲学底蕴,这甚至可以认为是一种根本性缺陷。一些著述看似深奥实际却不见得有深刻思想,有些作品以其思维活跃性和手段运用艺术性而著称,但并不蕴含价值理念和哲学眼光。所以,在冷战后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中,有些研究者表现出很强的时效性和灵活性,什么热就研究什么,国际上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就考虑其对中国的影响及其相应对策。这样的研究短期内也许显得精辟深刻,长期来看却乏善可陈,甚至成为过眼烟云。没有深厚哲学基础的战略研究难以支撑起一个大国的长治久安,以及探寻出一条不同于传统权力政治的和平崛起之路。

刘:那么,结合国际战略研究需要注意这些问题,您是如何看待中美战略关系的研究?

唐:在中美战略互动研究中,“敌人意象”或“零和博弈”的思路总是或明或暗地体现在文本中。有学者强调战略研究的“灵活性”与“权变性”,但一不小心还是滑向“极端化”或“简单化”。事实上,单纯的线性分析不适合认识中美关系复杂的现实。存在结构性矛盾并不意味着中美必然走向冲突。利益复杂交织,合作与竞争并存,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尽管存在结构性矛盾,使得中美关系远不具备盟友的性质,但在当前条件下强化大国间协调也是一种刚性需求,这极大地限制了中美相互之间恶化为“敌人”的可能。中国和美国并没有注定走向冲突,它们最终是伙伴还是敌人,将取决于政策互动而不是命运。因此,中美全面对抗的局面绝不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化解结构性矛盾对中美关系的消极影响,使中美关系真正向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方向发展,是两国未来共同面对的艰巨任务。中美两国在维护世界与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全球经济增长,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推动亚太区域合作,打击贩毒、国际犯罪和恐怖主义问题上;在加强双边经济发展、贸易、法律、环保、能源、科技、教育和文化交流与合作及两国军队往来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合作潜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绝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个漂亮的口号,而可视为中美关系可预见的出路。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认为,如果中美两国坚持走各自认定的正确发展道路,那就能够避免可能的战略对抗,实现殊途同归,而不是分道扬镳。

历史发展说明,中美存在明显分歧,但又相互需要,由此形成了一种既合作又斗争的特殊关系。对于中国,既要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又要推进中美关系稳定的发展,其关键就在于寻求和掌握这种合作与斗争的力度,把握中美关系的平衡点。

为此,要辩证处理合作和竞争、妥协和斗争的关系,不断积累战略主动,有效制衡恶性循环的产生,引导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因此,美国在对中国实施战略防范和遏制的同时,不会以“零和”方式展开博弈,对于美国,这不仅是一种战略制约,也是其必然的利益选择。

外交学院王帆教授曾经探讨美国对华战略底线与中美冲突的限度,他认为,“无论从意愿还是能力来说,中美均无法承受直接的军事冲突,也将竭力避免因为第三方的冲突而直接导致两国直接兵戎相见”。^①可以理解,从根本上而言,美国无法遏制中国的崛起,中国也难以挑战美国的霸权,更不会谋求将美国力量排挤出西太平洋。处理中美关系需要战略耐心,不能只关注冲突而看不见需求。大国间的关系应该更成熟一些,在一定条件下可冷却矛盾,待到时机成熟,双方自然会做出合乎历史方向的选择。台湾问题也是如此。目前,美国之所以还没有完全放弃在台湾问题上的模糊政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还没有变得足够重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将使美国做出一个最终的选择,不管这是不是它愿意接受的结果。

基辛格讲,美国和中国之所以认为彼此需要,是因为“两国都太大,不可能被别人主导;太特殊,不可能被转化;太相互依赖,承受不起彼此孤立”。^②这实际上是在为中美关系发展划定边界条件。对战略研究而言,认识问题的本质是关键,但有时候界定问题的边界也许更重要、更困难。对于美国战略调整,中国应有效应对,但要极力避免反应过度和战略上的冒进错误,不与美国进行硬对抗,而是要反向拓展合作的空间,有足够的战略耐心和信心推进中美关系

① 王帆:《美国对华战略底线与中美冲突的限度》,《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

② [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477页。

的积极发展。

刘:您如何评价中国学界关于中美结构性战略矛盾的论述?

唐:学界所讲的中美结构性矛盾是指由于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不同和对利益需求差异而产生的矛盾,并在一个时期以来主要表现为中国力量上升、利益需求扩展与美国维护其霸权安排的深刻矛盾,其发展和变化不仅以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的结构变动为背景,而且其本身也是国际体系整体结构性缺陷的一部分。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非常重要但相当复杂的一对双边关系。美国是对中国外部环境最具影响力和最具挑战性的国家;美国霸权的走向及其全球战略调整,也受到中国崛起因素的影响。中美关系未来如何发展变化,不仅对中美两国自身具有关键意义,而且在影响和构建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方面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任何一个崛起中的大国都不会得到现有霸权的欢迎,这就意味着中国在发展和塑造未来中美关系的进程中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同时,也必将面对诸多严峻挑战。

如何维护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也被学界所关注。战略稳定本来是指一个地区或全球的政治经济体系处于一种不易发生根本改变的、均衡的、自我保持、自我完善的状态,近年来,学者将这一概念用于中美关系分析,得出许多有益启示。有关研究已注意到,中美关系并不会按照矛盾冲突的逻辑单向和极端发展,因为在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逻辑之外还存在着日趋增强的约束力量或约束逻辑,中美之间利益融合加深、国际体系结构复杂化发展及由此带来的大国间协调需求,曾将中美关系多次从严重冲突的边缘拉回,也会继续推动两国共同利益的增加,并将促使两国一起承担未来的责任。

亚太地区战略形势演变对中国安全和发展构成最直接的影响。保持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亚太安全环境,不仅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可靠保障,还是实现持续发展、和平崛起的必要条件。因此,亚太战略形势的发展对中国对外战略发挥着重要的牵引和塑造作用,这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对外战略研究中,对亚太战略形势及其如何应对的分析都占有很大比重,而这种分析也将在中国与亚太关系的演变中得到检验。

需要注意的是,亚太地区也是容易引发中国战略失误的地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提醒保持战略定力的重要性,强调要在与外部世界的长期互动中逐步积累战略主动。不论对待自身发展,还是调整与亚太、与世界

的关系,都应避免急于求成,而应注重长远和全局。这种提醒十分必要。因为在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又是达到目的的最短途径,历史反复证明间接路线要比直接路线优越得多。中国要实现日益拓展的国家利益、消除外部威胁,总体上不能采取简单的直接路线,更应尽可能避免正面直接的对抗和碰撞,国家的长治久安需要开发更广泛的战略资源和更广阔的回旋空间,经过曲折的道路和较长时期的努力才可以达到。

四、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前景

刘:您对未来中国国际战略问题研究的深化有哪些期待?

唐:中国崛起及其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深刻调整将是一个长期进程。中国的大战略筹划既要为这一进程提供安全支持,也要在这个进程中得以实现和检验。在相同的内外部条件下,不同的战略选择会产生不同效果。尽管对外关系中存在诸多变数,但总体来讲,大战略选择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命运。如果大战略出现严重失误,操作和技术层面上再精准有力也难有大的作为。俾斯麦在19世纪德国统一后所实行的平衡和节制政策为德国争得了一段时期总体稳定有利的外部环境,然而一旦被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扩张政策所代替,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多面作战的困境也就不可避免,它在战争中收获的也只能是失败。

在众多大国中,如果从总体上衡量,美国的大战略选择至少到冷战结束都算比较成功,美国在和主要对手的较量中没有犯过非常严重的错误。事实说明,美国的战略设计能力非常强大,对此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和准备。中国的战略思考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在新的国际条件下,美国是否具备条件与崛起的中国下一盘大棋,就像冷战时期与苏联的那盘大棋一样,对此,中国应如何有效应对,以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承认,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战略研究毕竟起步较晚,积极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已成为构建和完善中国对外战略的迫切需求。作为具有深厚战略文化积淀的国家,战略研究领域的发展具有肥沃的土壤和广阔的空间,中国应该也有条件迎头赶上,进而引领国家安全战略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推进相关学术建设,锻炼和培养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和谋划所急需的人才群体。

军事科学院李际均将军提出,战略思想及战略传统的延续与改变,就像生

物学的遗传与变异一样,是一种发展中的逻辑。一个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形成与延续,取决于众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复杂因素,与民族经历、思想文化、军事遗产、地缘条件等都有直接紧密的关系。安全战略是现实的,历史上的战略思想能够在一定程度延续下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未来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客观联系。另外,具有生命力的战略研究不仅应该在认真梳理和充分借鉴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也必须充分考虑到国际关系背景的改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前提和约束条件的变化,同时应该力争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改进和创造。

为此,深化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应当借鉴西方的战略研究。当然,继承借鉴绝不能等同于因袭和照搬,其中包括对待发达国家一些比较成熟的国家安全战略理论的因袭和照搬。梁启超先生曾将学术研究的发展演进分为四个时期,一是启蒙期,二是全盛期,三是蜕分期,四是衰落期。以此衡量当前西方的安全战略理论及相关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当然不能简单断定其已经进入蜕分期,但具有蜕分期的许多特点。因为在这个时期,研究领域的“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得取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应用于别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焉”。“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①

与此对照,现实中相合之处不少。因此,对于众多的西方安全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在积极引进借鉴的过程中,应该取其精要,避免拘泥于细枝末节,更不要盲目追随,在不自觉中继承原有的缺陷,甚至局限于某一理论孤岛之上。

其次,在继承和借鉴中寻求创新和超越。我们赖以存在的民族特性和战略智慧应该发扬光大,以此为基础,才有条件推动学术创新,用更宽阔的胸襟面向世界。当前中国的安全战略研究首先应加强对国际局势演变规律的认识。战略研究的精髓就在于努力找到事物的内在规定性,进而能够比较准确地推及其未来走向,而战略谋划也只有在遵循国际局势发展演变的历史逻辑基础上才能表现出其应有的功效。对于安全战略筹划,寻找规律、适应规律、运用规律就是最大的创新。而要深化战略研究,关键也在于提升对重大战略问题进行规律性研究的能力,如此才能形成学术发展的坚实基础,否则很有可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4页。

能流于形式。真正高水平的战略研究,就是要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理清世界发展的基本线索,进而为维护国家安全寻找有效途径和方法。

在未来一个时期内,国际局势蕴藏新的重大变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也将日益增强。中国的战略实践将为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带来大量鲜活的经验和实践材料,这为中国战略研究方向定位,甚至建立中国视角的战略理论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强化中国视角或中国特征,这是战略研究社会科学理论属性所决定的必然要求。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明的大国,其历史、文化、思维方式和战略传统必将深刻影响并塑造中国战略研究的个性。

尤为重要的是,战略作为国家主观性和利益主体性很强的研究领域,以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认同人类基本的共同利益和价值取向的同时,必然在基本的利益观、价值观和行为逻辑上形成独具个性的观点和理论视角,并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以及战略思维中天下情怀、道德主义、注重防御等内涵,必然构成今天和平发展、兼济天下大战略的基本逻辑和历史根源。战略研究和筹划要为中国和平崛起和国际关系实践服务,要为推动战略理论的创新,也要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独特贡献。中国的战略文化必将在日益丰富的战略实践中得到发扬光大和独立,而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战略思想将构成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支撑。时代呼唤中国特色的大战略思考。

刘: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在创新性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您是否同意并举例分析?

唐: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显著成绩,我们看近年来关于“西进战略”的讨论。王缉思教授近年来提出的“西进战略”反映出学术界对中国周边政策的前瞻性思考。“西进战略论”也成为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向政策转化的典型案例。它对学界的主要意义在于拓展视野,引导学术研究注重周边战略平衡,探寻构建周边安全依托的有效途径。保持周边战略平衡应该成为经略周边的一个重要原则。围绕西进战略的相关研究发挥了这样作用。

王缉思教授认为,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战略再平衡”成为大国政治的关键词,美国强调战略重心东移、欧印俄纷纷“东望”“东进”,中国也不应将视野仅仅局限于周边沿海疆域或传统的竞合伙伴,需要有一种“西进”的战略眼光。西进不仅是国内发展西部地区、增加经济动力的重要举措;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我国参与大国协调,改善国际环境,增强竞争能力,满足战略利益

需要。在战略利益方面,西进有利于建立更加平衡的中美关系,增加中美战略互信,扩大中国在中亚、西亚、南亚、北非、东南欧等区域的经济利益,提升战略影响力。但西进战略也必须规避相应风险,平衡各方关切,做好战略统筹,不要将正常竞争视为零和格局或将经济问题过度政治化。^①

中国地域辽阔,不仅是太平洋国家,同时又处于亚洲心脏地区,随着实力的上升,已经成为除美国、欧盟和俄罗斯之外对亚欧大陆地缘关系调整发挥作用的一支重要力量。近来,亚欧大陆局势演变中不确定性有所增强,战略稳定面临新挑战,中国安全环境和长远安全形势也将受到深远影响,不同方向所受威胁具有联动性。积极经营和推进西线战略已变得日趋重要和紧迫。中国可充分利用陆向地缘优势和交通、运输等技术优势,积极参与亚欧经济合作和安全机制建设,经营牢固的陆上战略依托。经营西线不仅有利于中国建立东西战略平衡协调的有利态势,也有利于巩固和强化亚欧大陆地缘战略稳定。

关于“西进战略”,有些学者如李乾元、王海运等,也提出过具体的设想与独到认识。从中国自身发展进程看,强化西线战略也具有必然性。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也应看到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并不平衡,长期以来核心经济地带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并有进一步强化之势;与此同时,沿海方向又始终是中国安全环境最为复杂、受到外部战略压力最大的方向,由此也必然是中国战略关注的重点。

然而,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深刻调整和地区力量结构的变化,现实日益需要中国在继续重点经营亚太的同时,更加重视西线战略筹划,平衡战略全局,积极参与亚欧大陆地缘战略力量的互动进程。面对日趋复杂的安全环境,西线战略如果运筹得当,将会缓解来自东面的战略压力,反之将拖累东面的战略筹划。

近年来,世界和地区局势的发展,已经使欧亚之间在地理距离上空前接近,经济文化的相互渗透更是加强了欧亚间的直接联系。对比以往,欧亚各战略力量之间的互动明显得到强化,亚欧大陆战略整体性空前增强。经济科技发展和扩散,思想文化的渗透交流,使一切地理障碍变得不再难以逾越。正是由于这一背景,通过经营西线战略,进一步加强海向和陆向的战略协调才更具备条件。

^① 王缉思:《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战略研究简报》第73期,2012年10月12日,第1—4页。

维护国家安全不仅要在多方向、多领域取得平衡,而且要依赖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复杂联系和相互作用。在过去很长的时期里,许多国家曾经依赖直接使用军事实力来达成战略目的,也就是所谓军事实力的“现实运用”。但时至今日,国家在维护国家利益时可以选择的有效方式明显增多,不仅可以采取“现实运用”的方式,还可更多地采取“潜在运用”的方式,通过积极的战略布势、全局的战略平衡,建立起雄厚的战略支撑,迫使对手知难而退。而且,采取后一种方式甚至更符合安全局势的变化,也就是说,在战略上比较远的途径却容易达到较理想的效果。

刘:您如何看当前“一带一路”战略的研究热潮?

唐:“一带一路”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略周边的深化和拓展,对沿线地区乃至欧亚大陆的繁荣稳定都将发挥重要影响,因此,当前的研究热潮有其必然性。但也应看到,研究中也有一哄而上的倾向,什么话题都和“一带一路”联系起来,不利于研究的持续深入。在一定程度上,少说多做更有益于“一带一路”构想的推进。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有两方面需要加强:一是对沿线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形势进行深入细致的针对性研究,二是对综合性的地缘关系进行分析。

本质上,“一带一路”战略是当代中国新外交的重要实现途径,需要与其他各类战略和相应的外交资源相互配合,体现战略耐心,合理布局战略层次,注重战略决断等。这些课题都需要更细致深入的论证。在地缘战略关系的变动中,亚欧大陆腹地和中国周边一些地区的潜在危险和隐患有所增多。这就要求中国不仅要把安全政策的目标主要确定在当前热点和推进经济增长上,而且还要关注地区安全潜在的风险和安全机制的健康运转。为此,中国应提前布局,主动加强与相关地区的经济和安全联系,积极参与多层次地区合作进程,推动建立灵活有效的区域安全机制,进而有利于加强地区稳定。例如,应注重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向更具实际内涵的方向发展,充分调动发挥中国相关经济领域的实力,推进合作深化,增强类似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在相关功能领域和战略层面上的活力。当然,有关地区正在形成的其他机制也可以逐步充实一些新的实际内容,促进经济联系和安全对话的开展。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逸舟教授关于中国“创造性介入”国际事务的提法,深具启发意义,有助于理解中国在运作诸如“一带一路”这样重大的对外战略倡议时可能忽视的一些关键点。王逸舟教授认为,当今国际社会的利益复

杂组合并非一成不变,所以既要有顶层设计,宏观布局,又要建立动态、多层次的复杂平衡关系,对不同事态给予微妙而恰到好处的回应。事实上,“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确实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外交的自信与成熟化过程。

在王逸舟教授的论述中,创造性介入的战略含义还包括:以问题解决为旨归,强调发展、主权、责任三个目标面向的平衡。关注外交的主动性、引导性、建设性,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塑造开放、共赢、可控的外交局面。为此,需要改变外交事务的惰性保守成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参与中实现内政与外交的动态更新;善用经济抓手,合理配置外交和经济资源,协调各层利益,正向回应国家和社会对外交的硬需求,扩大战略目标的实现空间;善察社会民意,以人为本,增强公关意识,主动应对舆论;重视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创新理解主权含义,从战略与策略角度审视武力,探索非传统介入方式,坚持王道、避免霸道;等等。^①

实际上,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和战略思维中天下情怀、道德主义、注重防御等内涵,必然构成今天和平发展、兼济天下大战略的基本逻辑和历史根源。^②“一带一路”构想应该成为体现中国战略文化神韵的载体,并将其在具体实践中发扬光大,进而形成对中国民族复兴的强有力支撑。

① 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创造性介入:中国全球角色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② 周启启:《大战略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